

建筑理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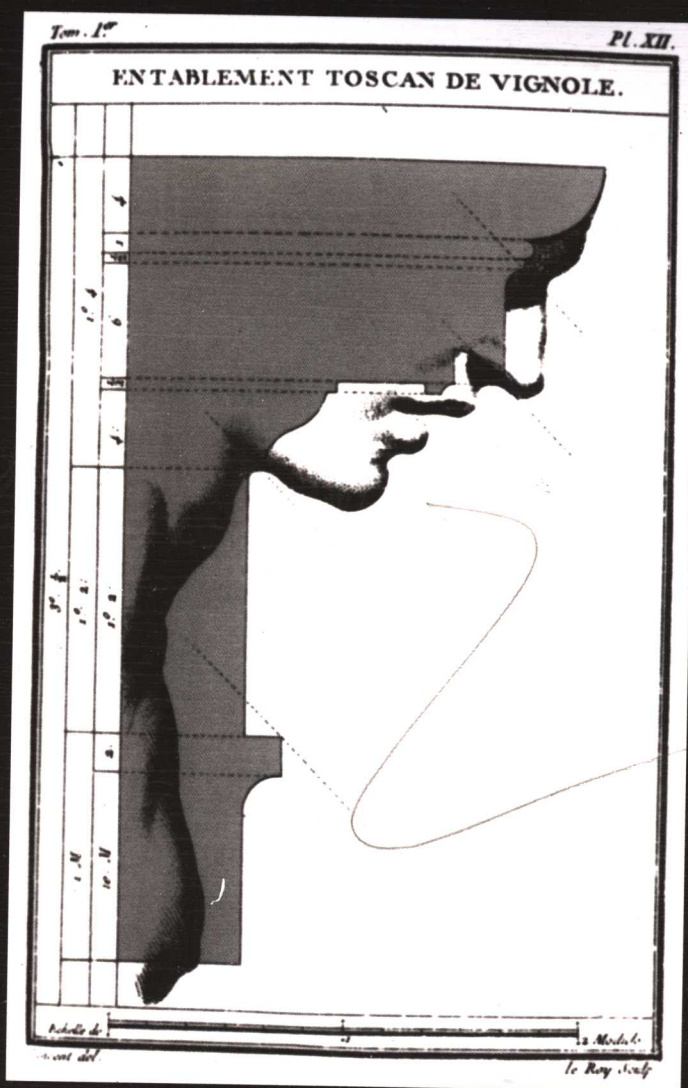
GESCHICHTE DER ARCHITEKTURTHEORIE

——从维特鲁威到现在

HANNO-WALTER KRUFF

[德] 汉诺-沃尔特·克鲁夫特 著

王贵祥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建筑理论史

——从维特鲁威到现在

[德] 汉诺-沃尔特·克鲁夫特 著
王贵祥 译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Theory: from Vitruvius to the Present
Geschichte der Architekturtheorie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by HANNO - WALTER KRUFFT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3-457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德)克鲁夫特著；王贵祥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ISBN 7-112-07078-3

I.建... II.①克...②王... III.建筑理论-发展-研究-世界 IV.TU-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51034号

Geschichte der Architekturtheorie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Theory: from Vitruvius to the Present

by Hanno - Walter Krüft

Copyright © 1985 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本书经 Verlag C.H.Beck 出版社正式授权我社翻译、出版、发行本书中文版

责任编辑：董苏华

责任设计：刘向阳

责任校对：刘梅 王金珠

建筑理论史

——从维特鲁威到现在

[德] 汉诺-沃尔特·克鲁夫特 著

王贵祥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

开本：880×1230毫米 1/16 印张：43¼ 字数：1600千字

2005年9月第一版 200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108.00元

ISBN 7-112-07078-3

TU·6311 (1303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http://www.china-abp.com.cn>

网上书店：<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要写作这样一部书，恐怕主要靠的是对于专业领域的成竹在胸，而不是靠某种天真与热情。只是在部分手稿跃然纸上的时候——谢天谢地——对我来说，以现代人的很不成熟的知识，对建筑理论历史所作的这样一种历史鸟瞰式的论述，才刚刚开始显露曙光，而这或许已经超出了笔者一个人的能力范围。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似乎是在进行一场障碍赛跑，我不得不将问题留给比我更为见多识广的人来确定，我已经绕过了那些障碍物，或者，还有一些障碍物我根本就没有看到。

这本书的问世依赖于一个简单的激励因素，即建筑系的学生们在学习中所反映出来的种种问题，在他们的课程中，开始提出有关理论的问题，以及有关理论历史方面的问题。我只能给这些问题提供一些不很完善的回答，没有办法对他们那些无可厚非的问题提供一个历史的界说。

从1972年以来，我在达姆施塔特科技大学(Technische Hochschule in Darmstadt)作了一系列有关建筑理论史的讲座，并开设了一个研究班，在这样一个课程过程中，我变得越来越希望进行这样一个历史鸟瞰式的研究。这本书是这一过程的一个结晶。我最初的设想是为每一特殊历史阶段中尚存的第二手文献描绘出一个大致的范围，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我惊奇地发现，围绕这一主题的许多方面，并没有这样的文献存在。我越接近那些文献资料，就越深刻地体验到需要追溯到这些文献的最初源头，对这些文献的反复阅读，使我更增加了对尚存的第二手材料的顾虑与怀疑。因而，我意识到对于这一课题的任何可以接受的概论性描述，都应该是基于最初的源头上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述而不作，如果我能够做点什么事情的话，那就是对于源头问题不作述评。

如果没有许多图书馆的慷慨相助，我几乎不得不放弃那些有价值但不容易获得的第一手文献，因为这些文献很少见之于人们的研究，而这些文献是这一整个研究课题的基础。最后，在德国达姆施塔特黑森州立图书馆(Hessische Landesbibliothek, Darmstadt)，罗马的赫尔茨安南图书馆(Bibliotheca Hertziana, Rome)和梵蒂冈教廷图书馆(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Rome)，慕尼黑的艺术历史研究所(Zentralinstitut für Kunstgeschichte, Munich)和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unich)，奥格斯堡的奥廷根-瓦勒施泰因图书馆(Oettingen-Wallerstein Library, Augsburg)，以及其他一些机构与部门的最具权威性的资料来源的支持与帮助下，我才得以追溯到那些文献最早的版本与最原始的材料上去。首先的感谢应该给予上面的这些图书馆及各个机构与部门。

而在这本书的一些个别章节中，我向专家与同行们作了咨询，并请他们阅读了我这本书的手稿中的部分章节。我从他们的批评与建议中获益匪浅，尤其是从罗马的赫尔茨安南图书馆(Bibliotheca Hertziana)的那些学者们那里获得了许多帮助。

一个特别的问题是确定如何用一种简明扼要的，但却不是过于简化的可以让人读懂的形式来描述这些原始

* 边码为英文版原书页码。在编排中文版时，我们特意将英文版原书相关内容所在页码标注于中文版相关内容边上，以便于读者对照英文版原书阅读、查询。——译者注

材料。我几乎不能设想一个人能够一页一页地读这本书——人们宁愿，将兴趣集中在一些特殊的问题上，读者们自己就会顺着时间的线索向前或向后寻找问题的答案。

提供一个完整的参考书目并不是我的目标，我更倾向于提供一些我认为是基础性的特殊的原始文本。任何试图覆盖所有文献的想法毫无疑问地会导致陷入纯粹材料堆积的泥潭的危险。这样一种理想的状态只是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才是可能的，例如约翰尼斯·德拜(Johannes Dobai)有关英格兰的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艺术的杰出著作中所显示的文献情况；的确，这本书不仅引起我的崇敬，也不断地提醒我，任何与之相当的尝试都将是不现实的。相反，我着力于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最重要的和最具有代表性的内容之上。我一直将目标设定在追求某种选择的平衡上，虽然我清楚地知道，如果选择其他文献来源，我所强调的重点也将会有很大的不同。在最后的分析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说一些套话，譬如，一个人只能写那些他所了解的，或相信他已经了解的东西。

从事建筑理论史的工作必须基于原始资料与文献，我清醒地意识到我依赖于那些为艺术创造了文字的历史的学者们，首先就是朱利叶斯·冯·斯克劳瑟(Julius von Schlosser)。因而，与他的著作相比，一部建筑理论史等于没有写。我自己的著作在涉及一些特殊的历史阶段的时候，无疑获益于鲁道夫·威特克沃(Rudolf Wittkower)、艾米尔·考夫曼(Emil Kaufmann)、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和其他一些杰出的学者。同时，那些一直关注着这一课题的读者们将会注意到我的判断与他们的判断有时会有显著的不同。我的关注点并不在于讨论如何解释各种建筑学的理论，而在于为理论本身提供一个界定性的论述；这部特殊的思想史，是从这些理论本身中一点一滴地汇聚而成的，而不是从任何预设的知识框架体系中生发而成的。

我也一直十分清楚地知道，在这一特殊的知识领域中，一直有一些专家与学者，在寻求某种宏观的解释方面，远比我所做的工作要杰出得多。但是，这种非常宏观的研究也赋予我一种洞察力，使我能够注意到一些常常被专家们所忽略的联系。回顾起来，这一特点为我的工作提供了主要的合理性。

插图在建筑理论中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这本书包括了一些经过选择的各类插图。在寻求原始资料的过程中，笔者有幸准备了一大批照片和原始插图，这里所提供的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

参考书目保持在一个限度以内，所列出的资料来源是与构成这本书的主题密切相关的。有关个别理论家的第二手文献以及一些特殊问题的被引证，仅仅出现在注释中，并且不再在参考书目中出现。我所阅读的第一手与第二手资料比我已经讨论或引用的要多，但书中标题的选择，则将提供一个总体的框架，并且给读者以如何深入这些问题的建议。大多数读者也将会对这样一个事实表示欢迎，即我详细引证了现代重新发行的原始文本的细节，我对这些新版文献的出处了如指掌。

对于许多曾经和我讨论，给我建议，予我帮助的朋友与同事怀有深深的谢意，我这里只能提及其中的一些：慕尼黑的汉斯·贝尔汀(Hans Belting)，基尔(Kiel)的阿德里安·冯·巴特拉(Adrian von Buttlar)，罗马的克利斯托夫·鲁特波尔德·弗罗麦尔(Christoph Luitpold Frommel)，波士顿的约翰·赫尔曼(John Herrmann)，佛罗伦萨的朱力安·克利曼(Julian Kliemann)，达姆施塔特的赫尼尔·奈勒(Heiner Knell)，乔治·弗利德里奇·考克(Georg Friedrich Koch)，奥斯陆的马格内·马尔曼格(Magne Malmanger)，伊斯坦布尔的维也纳人小沃尔夫冈·穆勒-沃尔特(the late Wolfgang Müller-Wiener)，罗马的克利斯托夫·索内斯(Christof Thoenes)。如果不是从这些具有全然不同专业背景的朋友那里获得帮助，我是不可能激发出那些有价值的思考的。

[9] 我十分感激达姆施塔特科技大学艺术历史学院(Institut für Kunstgeschichte at t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Darmstadt)和奥格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Augsburg)摄影实验室的技师们，是他们精心地修复了那些照片。

原书出版商的说明

需要我们非常痛心地加以说明的是，本书的作者已于1993年9月不幸早逝，当时这本书已经付梓印刷。

英文版序

这个译本是根据慕尼黑的沃拉格·C·H·贝克(Verlag C. H. Beck)1991年出版的德文版的第三次印刷为 [11] 依据的,只是作了些许的修改。贝克于1991年印刷的文本的主要部分保持了第一版的特点而没有什么改变,这本书能够被读者广泛接受,说明其中没有大的缺陷。我有机会在最需要的地方对注释作了补充与更新。我从参考书目与注释中将那些与目前这个译本无关的德文翻译删除了,出版商列出了英译文资料的来源。在德文版第三次印刷中对参考书目所作的补充,以与主要参考书目一样的处理方式,已经包含在了这本书中。

经过扩展的引言部分出现在英文译本之中(译文中的大多数是为这一册书特别准备的),并在尾注中附上了原始语言的文本。我的英国出版商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系统性的效果而费尽周折,为了这一目的而提供或翻译了我在这本书的最早版本中从已经出版的德文译本中所引用的原始文本。我特别希望对利萨·亚当斯(Lisa Adams)表示感谢,她帮助我为英国出版商在需要的地方提供了原始的拉丁文、希腊文和意大利文的文本,或者附上这些文本的标准英文译文,或者提供新的译文。所引用材料的拼写及大写,包括标题,都附有原始文字。关于我这本书的英文版文本,我十分感激罗纳德·泰勒(Ronald Taylor),埃尔希·卡兰德(Elsie Callander)和安东尼·伍德(Antony Wood),在玛格丽特·库兰(Margaret Curran)的协助下,他们将一些十分晦涩难懂的德文句子翻译成了在我看来十分漂亮的英文。我也深深地受惠于阿拉斯泰尔·莱茵(Alastair Laing),以及约翰·纽曼(John Newman),杰里米·迈尔文(Jeremy Melvin)和亚历山大·韦奇伍德(Alexandra Wedgwood),他们为最后文稿的完成而贡献了自己的知识与技能。

中文版序

提高全社会的建筑理论修养

吴良镛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建筑的思想与技术渐渐地影响了中国，从一些有关西方建筑历史的译著与论著中，人们知道了在公元之初，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提出了“坚固、实用、美观”的建筑三原则；在文艺复兴早期，阿尔伯蒂在《建筑论》中也论述了“实用、坚固、美观”三原则（顺序略微变动了一下）。虽然这两本书有过中文的译本，但是，他们的思想对西方建筑有过什么影响，在他们之后出现过一些什么样的建筑理论家或有影响的理论著述，不同时代的理论家对当时的建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20 世纪的现代建筑运动与西方建筑史上的这些理论思考有着什么样的关联等，系统的研究并不多见。关于这一问题，我主要想从两个方面来谈一谈自己的认识与想法。

—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西方建筑理论史巨著，其涵盖面之广，内容之丰富，古今之贯通，考据之周详，立论之坚实，是令人惊异的（即便浩繁的注释，对学习者来说，也不乏具有与正文同样的参考价值，提供进一步深究的线索）。这不仅反映了作者在治学上的严谨，也说明了西方建筑理论本身是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庞大体系，很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和研究。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在这浩如烟海的建筑理论史知识中领略要点，融入自己的知识系统，提高建筑理论修养，下列诸点将促使我们加深认识。

（一）西方建筑理论有一个漫长的积淀过程

在西方世界，建筑理论不是短时间内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淀过程。从古罗马的维特鲁威到中世纪，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通过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努力到启蒙运动，第一个建筑学的理论体系才在古典主义的基础上萌生出来。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渗透到各个不同国家的文化之中，直至酝酿并发展出了西方现代建筑理论，构筑成较为完整的体系。

西方建筑理论的奠基人是古罗马时代的维特鲁威，他写出了现存西方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建筑理论著作——《建筑十书》。在维特鲁威之后的中世纪及拜占庭时代，也曾出现一些建筑理论著作，但都没有像维特鲁威那样，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中世纪加洛林王朝时期，人们出于对拉丁文的兴趣，重新发现了维特鲁威，从那以后维特鲁威著作手抄本就是传递这一建筑文献的主要形式。15 世纪初叶，出现了另外一位在西方建筑理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建筑理论家，他就是阿尔伯蒂。阿尔伯蒂也仿照维特鲁威的做法，写了内容有 10 书之多的《建筑论》。在阿尔伯蒂之后，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来临，建筑理论著述日益增多，菲拉雷特、迪·乔其奥，甚至文艺复兴的大艺术家莱昂纳多·达·芬奇，都曾有关于建筑理论方面的论著与论文。而文艺复兴时代

的塞利奥、维尼奥拉、斯卡莫齐,以及著名建筑师帕拉第奥都曾有系统的建筑理论著作问世。此后的17、18世纪更是西方建筑理论的传播期、深化期,除了体系化的建筑理论著作之外,一些关于古典建筑柱式及建筑各部分做法的图册,也越来越多地充斥坊间。

正是在这一连续而持久的理论求索中,西方各个时代的建筑思想家们循着维特鲁威这条主线,无论是对他的追随、深化或反对、修正,都是围绕着更为深刻地认知“建筑是什么”这一经久不衰的古老问题而展开的。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下,通过对一些建筑基本原则,如“实用”、“便利”、“坚固”、“美观”、“愉悦”、“得体”、“装饰”等概念的反复讨论与反复定义,人们对建筑的认识一直在不断地充实与发展中。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漫长而连续的讨论与探索过程,西方思想中,关于建筑的基本理论体系才得以确立并延续、发展,并且至今指导、影响着西方建筑的发展方向。

(二) 西方建筑理论中有建立在理性思维与科学文化哲学思想基础上一以贯之的基本问题

西方建筑理论的发展历史,虽然经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有过纷繁的发展样态,但是却始终保持了某些一以贯之的东西,如建筑的功能问题、建筑的形式问题、建筑的结构问题、建筑的材料问题。这些问题在两千年以前维特鲁威的建筑理论著作《建筑十书》中就已经明确地提了出来,而在两千年之后的现代建筑运动中,这些问题依然是西方建筑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说,在建筑学领域中,西方人正是在一些十分基本的问题上反复地琢磨,深入地思考,不断地研究与探讨着的。虽然问题仍然是老问题,是一些十分基本的问题,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生活在变化,理论的视角在变化,思维的深度在变化与发展,针对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在变化,甚至会出现重复或倒退。但总的说来,既立足于基本问题,又随着时代与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地拓新、赓续与发展,这可以说是西方建筑理论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特点。

例如,公元1世纪的维特鲁威,就将建筑定义为“坚固、实用、功能”三个基本原则。而到了15世纪初的阿尔伯蒂,其关于建筑的基本定义仍然是“实用、坚固、美观”。在此后的一个时期中,这些基本观念的内涵与外延被进一步扩大,如“坚固”这一范畴中,包含了材料、结构、技术等概念;“实用”这一概念,不仅进一步深化为“适用”、“便利”、“舒适”,而且包括进了经济、卫生等概念;而“美观”这一概念则被不断地讨论并加以深化,文艺复兴以来的人们将这一概念外延为愉悦、悦目,并进一步细化为尺度、比例、均衡、对称、和谐、得体,甚至个性等一系列审美观念。

1. 西方建筑理论的“理性”传统

纵观两千年西方建筑理论的历史,如万花筒一般,可谓色彩斑斓。但是,西方人的建筑思想展现一种现象,即理性思维在西方人的建筑思想上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这一思维在建筑上主要表现为因果关系的逻辑性,即首先是对建筑之材料与结构的恰当选择。这表现为建筑理论中的“坚固”概念,接着是对建筑之逻辑性目的——“实用”的追求,使建筑摆脱了古代巫术与神话的迷惘,径直迈进了理性的殿堂。理性概念是古希腊人的重要哲学范畴之一。经过漫长中世纪的宗教迷蒙之后,理性之光又一次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上萌发出来。17世纪的牛顿科学革命,使宇宙纳入了一个可以用数学计算的体系之中,从而,运用数学和力的概念来理解各种现象,也包括建筑造型现象成为了当时的时尚。这就推进了建筑在造型比例上的探索,例如,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对称”、“比例”等概念,从而也使理性进入了“美观”或“愉悦”这一传统上主要由感觉所把握的领域。

理性还表现为规则性,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理论家帕拉第奥与斯卡莫齐,就是以理性的观念,反对巴洛克艺术的扭曲与变形。斯卡莫齐还特别思考了“材料的真实性”问题,认为建筑师不应该强行对一种物质进行塑造:“实际上,建筑师试图对材料施加强力不是一件十分值得赞赏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应当不断探寻,从而将自然创造纳入到自己的意愿之中,来获得他所需要的造型形式”(见本书第八章)。斯卡莫齐的立场是明确的:建筑师应该根据科学与数学的标准来进行设计造型,要充分考虑所使用材料的特性,并明确地表示说,应当尽可能使用当地可以获得的建筑材料。这些都反映了他在建筑创作中的理性立场。而与斯卡莫齐大约同一个时代的盖拉西尼则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任何人一旦违背了“合乎逻辑的建筑理性”,就不再与建筑师的头衔相配称。他坚持认为:“只要不遵循规则就会出现混乱,只要出现了混乱就会出现畸变,出现了畸变也就再也不可能有完美可言了”(见本书第八章)。这种理论见解甚至影响到了西方现代建筑思想的发展,当

然,不同时代对于建筑之规则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但作为一种理性思想的脉络,其中内涵的积极意义却一直影响着西方建筑发展的道路。

西方现代建筑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形式服从功能”,就是这一理性观念的一个延续。在西方历史上,建筑的实用性原则,从维特鲁威开始,直至20世纪现代建筑运动对功能问题的特别关注,贯穿两千年之久,其一以贯之的核心,就是理性。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例如我们熟知的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箴言的生活于16至17世纪之间的英国哲学家培根,就是在理论上极力主张建筑之功能性原则的,本书的作者甚至将他看作现代功能主义思想的先驱(见本书第十九章)。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在西方人的功能性原则中,还包含有经济的因素在内,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合乎功能原则的建筑,也应该是一座经济上合理的建筑。在西方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建筑的经济性甚至被特别地提到了理性的层面,如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建筑师夏尔·佩西耶等,在他们的论著中阐释了文艺复兴建筑中就已经存在着的“节约理性”的观念,并认为建筑的目的是“用最简便的方法获得最大的效益”(见本书第二十一章)。这样一种富于理性色彩的建筑中的节约概念,对于社会与经济尚处在迈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我们,应该是不无启发的。

至于建筑的美观性原则,尽管是一个远为复杂得多的问题,但在西方建筑思想史上,也是数千年常议不衰。到了17世纪,在法兰西建筑学会中,甚至还围绕建筑审美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展开了一场大辩论,由此而生发了美学与心理学中有关“移情作用”,以及哲学中有关感觉、感知等问题的讨论与研究。20世纪建筑理论中对于形式问题的特别关注,就是在这一原则下衍变出来的。这说明气象万千的西方建筑理论,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却是始终如一的,其中确实存在着某种古今一贯的东西。

2. 西方建筑的文化哲学传统

建筑是一种文化现象,建筑文化中包含有物质性的形体、空间,与精神性的思想、理念。形体、空间是建筑的本体,是建筑创作的结果;而思想、理念则是建筑的灵魂,是引导建筑实体得以实现的纲领。世界上各种有生命力的文化,其基本的特征之一,正是持之久远的历史传承与代代更新的文化活力。西方建筑之所以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文化中的建筑,其根本的原因,不仅在于所使用的材料和技术,或所处的地理环境,更在于基于文化根基之上的建筑理念上的差别。古代希腊人的理性与逻辑,以及柏拉图对于“真、善、美”的论述,奠定了维特鲁威“坚固、实用、美观”的建筑三原则,也奠定了西方人的基本思维模式。如上所述,作为其文化传统之一的理性追求与逻辑性表述,几乎贯穿了西方建筑理论发展历史的全过程。

例如,这种文化哲学体现了一种对于古典建筑传统的重视,文艺复兴的建筑巨匠们都曾有过测绘古代建筑遗迹的经历。系统地出版古代建筑的测绘图,对古代建筑的各种柱式与装饰进行研究,探索其中的规律,分析其中蕴含的比例关系,并用图示的方式出版发表,用以指导当时的建筑设计,是西方建筑理论著述的一个主要内容,这就使得西方建筑历史上的各种文化特征,及其形式符号语言,以一种文化基因的方式,历代传沿嬗递。同时,在一种基本的文化传承的基础上,西方人还不断发掘与丰富自己时代与民族文化的宝藏,如一度被古典建筑家视作异类的哥特建筑,经过理论家的阐释而跻身于西方主流建筑之列。而17、18世纪以来,争相探索本民族建筑的造型与柱式特征,成为西方各民族国家建筑史上的一大特征。直到19世纪西方各国出现的罗马复兴、哥特复兴、希腊复兴等建筑形式,都是这一文化趋势的余绪。这也许正是西方传统建筑虽然千变万化,却并没有超出古典式与哥特式这两个基本的形式范畴之原因所在。

西方文化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建筑学科学特性的强调,以及对建筑学在其他艺术中所处地位的突显。如斯卡莫齐将建筑学看作是一门科学,其法则就是“理性”。他认为建筑学是所有科学中最有价值,也是最重要的;建筑学独自为整个世界提供装饰,为万物提供秩序,设计工作完全成为一个科学过程;发明就是对于数学的直接应用,形式的创造是通过“构思”而建立起来的,建筑师就像是一位无所不知的百科全书的编撰者(见本书第八章),等等。

(三)西方建筑史上出现了伟大的建筑师,反复论证建筑师的作用与建筑师的培养是建筑理论的重要内容

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一大批建筑思想家在不同时代的理论走向,如塞利奥、斯卡莫齐、帕拉第奥、维尼奥拉,以及后来的维奥莱-勒-迪克、莫里斯、拉斯金、格里诺、沙利文等等,可谓是群星灿烂。甚至

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莱昂纳多·达·芬奇也十分关注建筑理论问题，达·芬奇绘制的人体比例图与维特鲁威用来说明比例问题而绘制的“维特鲁威人”，以及20世纪勒·柯布西耶绘制的人体模度图，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反映了西方人在人体与比例问题上的深邃见解。意大利人康帕内拉的《太阳之城》，英国人莫尔提出的乌托邦思想，和后来问世的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等书，以及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及其实践，直至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乌托邦式的“乌索尼亚”理想，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对一种理想的城市与建筑的探索与追求。这也反映了西方人在思想理念上所存在的某种关联性。

西方人的这一传统，体现在西方文化中对于建筑师作用的重视与强调。如阿尔伯蒂所指出的：

在我看来，能够与其他科学中最伟大的大师们并列在一起的人物，既不是木匠，也不是一般的工匠；手工操作者并没有比建筑师手中仪器的作用更大。我所称之为建筑师的人，从完美的艺术与技巧的角度来说，是通过思考与发明，既能够设计，也能够实施的人；是对于(建筑)工作过程中的所有的部分都了如指掌的人；是通过对巨大重物的移动，对体量的叠加与联结，能够创造出与人的心灵相贯通的伟大的美的人。

他认为建筑师在社会上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我得出的结论是，为了公共的服务、安全、荣誉，及美化，我们应该充分地仰赖建筑师；正是由于有了他们，我们在闲暇的时间里，享受到了宁静、愉悦与健康；而在我们工作的时间，则得到了帮助与效益；但无论在闲暇或工作时间，我们都获得了安全与尊严。

建筑师还应该是(社会)精英中的代表人物：

毫无疑问，建筑学是一门十分高尚的科学，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胜任的。一位建筑师应该是一位天赋极佳之人，是一位实践能力极强之人，是一位受过最好教育的人，是一位久经历练之人，尤其是要有敏锐的感觉与明智的判断力之人，只有具备这些条件的人，才有资格声称是一位建筑师。在建筑师的业务中，如果说能够判断出什么是适当的或是得体的，就是得到了最高的赞誉：因为，虽然建筑是为了满足需求，同时，功能性建筑既要满足需求，也要满足使用；只有用这样的方式建造，虽慷慨大方而不失于奢侈，虽节俭朴素而不失于屈辱，这才是那些谨慎、明智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建筑师的作品。

(以上所引三段均见本书第三章)

从如上的引言中可以看出，在西方建筑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的阿尔伯蒂心目中，是将建筑师所起的作用清晰地定义为人类环境的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塑造者。而在阿尔伯蒂之后的菲拉雷特看来，建筑师更应该是一个兼有科学家与人文主义者双重特质的人(见本书第四章)。

(四)建筑理论在争论中发展

重视建筑理论的讨论与争论也是西方人的一个特点。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建立在不断地争论与完善的基础之上的。西方人围绕建筑理论问题的争论与讨论，贯穿于西方的整个历史，并且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西方历史上的一些建筑学术机构，如1671年建立的法兰西建筑学会，实际上既是一个建筑思想传播的讲坛，同时也是建筑理论争辩的论坛。关于美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大争辩就是在这样一个学术机构的平台上展开的。在学会创办的初期，学会工作的重要日程之一就是定期地在学会内部大声地朗读历史上重要的建筑理论文章，并围绕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讨论与争辩，并邀请当时的知名学者在学会内部进行讲演。正是由于有着十分开放而内容广泛的争辩、讨论、讲演、著述，使西方历史上的建筑学者们有着充分的话语权，从而使西方人的建筑理论著述极丰，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具时代特色的建筑理论著作出版。而大量建筑理论著作的问世与流布，使得我们能够对西方建筑理论的发展洞若观火，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发展的脉络。

例如，巴洛克时期著名的建筑著作是由菲舍尔·范埃拉赫所写的《历史建筑概览》，最早开始了比较世界

建筑史的研究,并第一个将中国建筑引入了欧洲人的视野,使建筑与文化的关联更为密切。而18世纪后半叶德国的祖尔策,则将建筑归为“美的艺术”;他以“适用”和“坚固”概念为开端,然后笔锋一转,开始写它们的“效果”：“钦佩、敬畏、着迷、庄严肃穆……这都是由鉴赏品味引导的天赋的效果”(见本书第十五章),从而将建筑纳入了艺术鉴赏的审美领域。

各个时代的人不断对建筑提出自己理解的原则。文艺复兴建筑理论家帕拉第奥曾经对我们今日所说的手法主义(Mannerist)提出了苛刻的批评,原因是这些建筑的“莫名其妙地滥用,随心所欲地独创和毫无必要的花费”,以及它们所造成的人为性破坏。在帕拉第奥看来,好的建筑需要的是“简洁”,以达到能够“接近另一个自然”的目的。他认为一座美的建筑也意味着是一座真实而良好的建筑。显然,在这里帕拉第奥代表了新柏拉图主义者关于真、善、美三者相统一的观点。认为任何违反理性的事物,也都是和自然,同时也是和“艺术的普遍与必需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在帕拉第奥看来,建筑就是理性、简洁、古典(见本书第七章)。

事实上,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帕拉第奥和斯卡莫齐开始,对于建筑的陋习所进行的批评,成为建筑论著的一个常规话题。而这种话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当时流行的“建筑的手法主义和早期巴洛克风格表示了反对”(见本书第八章)。遗憾的是对于巴洛克艺术作理论探索的论文,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上,却十分罕见。

法国建筑界一直十分注重建筑理论问题,1671年,法兰西建筑学会成立,学会的任务就是通过一些决议并最终形成一些建筑美学的标准。在笛卡儿理性主义哲学精神引导下,一切问题的讨论基础都是以理性为原则的,因为,在这些理论家看来,法国需要的是“普遍的秩序”和理性的完美。

正是通过这些理论争辩与建树,使得西方建筑理论大厦变得充实而丰富。其实,现代西方建筑理论上围绕许多重大问题所产生的歧义与争辩,都可能回溯到其历史的源头之上。因而,对西方建筑理论史的回顾,也是对西方建筑思想发展史的回顾。

(五)建筑与城市的关联

在西方建筑理论中,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建筑理论的发展与城市概念的引申。从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中专门论及城市的章节开始,到文艺复兴时阿尔伯蒂名言,“把房屋当作一个城镇,把城镇当作一座房屋”(the house as a town and town as a house)。15世纪的建筑理论家菲拉雷特,在他的著作中所描述的斯弗金达城是第一座经过完整规划的,有着更多图示材料的文艺复兴式“理想城市”。他在书中所描述的不仅是这座城市的布局与形状,而且也包括城市所坐落的地理环境景观(见本书第四章)。后来的迪·乔其奥沿袭了维特鲁威人体测量学的观点,认为每一种艺术与计算都应该从比例优雅的人体中演绎而来。他在他的建筑与城市理论中运用了有机性术语进行表达,例如,他谈到了“城市的身体”,认为城堡作为城市中“最高贵的组成部分”,应该处理得像人的头部那样(见本书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莱昂纳多·达·芬奇的建筑思想中,特别涉及了他在城市规划方面的创造性思想,在经历了1484-1485年的大瘟疫,米兰公国丧失了1/3人口,这促使达·芬奇详细阐释了他的城市规划概念,这一概念就是基于分散原理、城市发展,以及卫生学等方面基础之上的城市规划理念。他为一个有运河穿越的滨河城市,采用了网格式的平面布局,并采用高低不同的标高,形成各司不同功能的城市立交,以及专门的垃圾运送通道构想等重要思想。可以推测,达·芬奇所做城市规划的前提,明白无误地是功能性的: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将不同种类的交通分离开来,以及卫生设施的设置等问题(见本书第四章)。

文艺复兴的“理想城”理论与思想发展无疑也是很值得重视的文献。与塞利奥大约同一时期的卡塔尼奥,将城镇规划第一次描述为建筑的中心任务,他认为:“建筑学最为杰出的方面,无疑是有关城市的种种处理”。他的第一书详细论述了城市中建筑基址选择的标准,并进一步运用象征学方法,表达了他对正方形和正多边形平面的青睐。他还喜欢使用棋盘格系统,大教堂和那些最重要的建筑物,占据了中心部分的方格。与迪·乔其奥一样,他也把城市比作人的躯干,如果加上四肢,它就会本能地渴求一个完美的造型比例(见本书第六章)。

16世纪的德国人丢勒的筑城理念把筑城的实践观察和理想城市的乌托邦构想结合在了一起(本书第九章)。博洛尼亚的德·马奇设想筑城设计与城镇规划应当是一项相互协作的任务,建筑师在其中的角色是制定规划并监督建造过程。16世纪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也包括有建筑与城市规划方面的思考。此后的

培根所写的《新亚特兰蒂斯》则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对100多年前莫尔提出的乌托邦作出了回应。1822年托尼·加尼耶(Garnier)设计的“工业城市”,是“第一次从整体概念直到单体建筑进行综合设计的尝试”。而20世纪由勒·柯布西耶进一步提倡的“现代都市规划”,尽管被本书的作者批评是“人们曾经写过的有关建筑理论最为糟糕之书,影响了城市规划20年,甚至闯进雅典宪章中”,但是,无论在建筑与城市规划中,其影响都是相当巨大的。此后的意大利未来派建筑师安东尼奥·桑特埃利亚(Antonio Sant'Elia)在1914年7月14日发表了未来派宣言,并附有大量关于“新城市”的描绘,在这篇宣言中,一个新的观点是,认为未来派建筑具有某种暂时性的观点,并将每一代人都必须建造他们自己的城市的原则结合了进来:“房屋并不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持久,每一代人都将不得不建造他们自己的城市”(见本书第二十七章),以及赖特的“城市疏散主义”,沙里宁的“有机疏散论”,乃至诺伊特拉的建立一个严整的网格规划和交通体系基础之上的快速城市(Rush City)方案(本书第二十九章)等等,说明建筑观念的展拓与城市观念的建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大规模建设中的中国建筑师更要意识到西方建筑发展的这一历史现象。

在本书里,作者还用了专门章节论述欧洲园林概念从16世纪至19世纪下半叶的发展变化,并涉及1772年曾经来过中国的钱伯斯(T. W. Chambers)所写的《东方园林论》一书对西方的影响,特别是西方园林中借用中国造园思想而创造的“疏落有致”(Sharawadgi)的园林概念,以及对园林中“如画风格”的追求(见本书第二十章),都反映了中国古典园林对于西方园林艺术曾经产生过的影响,对此我们应予以重视,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六)现代建筑革命,现代建筑之后的徘徊歧路

开始于西方世界的现代建筑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全新的革命。这样一场建筑革命的发生,首先是因为技术上的进步,材料上的发展。人们从传统的建筑材料:土、木、石中渐渐挣脱出来,面对了崭新的建筑材料:钢、混凝土、玻璃。新的材料与新的需求,以及新时代人们崭新的精神追求,使20世纪西方建筑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与变革。当然,从建筑理论史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变革也需要经过极大的努力,新思想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酝酿,也存在过相当顽强的抵触和曲折的认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即使是一些具有新思想的建筑师,也会为旧有的手工业的技术与工艺,逐渐失去往日的光焰而大感困惑。19世纪末的一些建筑理论家,在追求新思想的时候,其基本的出发点却恰恰是想保持住古老的手工艺,就是这样一种历史现象的反映。例如,在20世纪初,“德意志制造联盟”显示了新思想发展中多种矛盾交织的阵痛,显示“经济与艺术之间的矛盾从来没有缓和过”这一基本事实。新的时代、新的技术、新的材料、新的艺术观念,以及西方人在哲学与理论上的新探索,使得西方现代建筑形成大体完整的体系,其光彩照人的新篇章,有其自身独特的美学思想与理性思维逻辑。但是,需要特别提出的一点是,现代建筑对于传统的割裂与排斥,其实也埋下了某种否定自身的种子,例如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即开始引起社会学家芒福德等人以“地区形式”对“国际式”的批判,等等。

现在的世界已经远远不同于传统的世界,在现今的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够在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情况下孤立地发展,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事实上,由于中国近代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比较复杂,也比较缓慢,中国对西方建筑理论与实践的了解原本就比较少,加上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一度与外界隔绝,西方现代建筑理论在中国并没有造成很深的影响。到了80年代,中国的国门洞开,忽然面对的却是一个全然不同于50与60年代现代建筑运动风头正盛的世界。比如,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充分消化西方现代建筑运动的理论内涵,西方人却突然在那里匆忙地宣布“现代建筑已经死亡了”,其结果是搞得我们束手无策。

由于纷繁复杂的西方现代哲学的冲击,西方社会在文化、哲学与思想理论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与分散化的情景。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是当代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但这显然又是一个变化过于快速,但却始终不很成熟的时代。不成熟的结果就是混乱。事实上,20世纪最后20余年的西方建筑理论出现了十分多样与混乱的局面。这种混乱与不成熟,也反映了这一时期西方建筑理论的肤浅。比如,由于西方现代建筑在兴起的进程中,一度背离了传统,随着现代建筑运动的发展,这一日益远离传统的做法,在一些人心理上造成了一种逆反,结果就出现了某种盲目地回到传统的做法,其表现就是西方后现代建筑的流行。其实,后现代建筑的某些做法,即使是一些赞成传统的人们也不是十分认同。

诚如前述,20世纪西方现代建筑在理论上呈现了较为多样的形式,出现了许多思想与流派,从新艺术运动,到风格派建筑,以及功能主义、极少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结构主义、文脉主义,和理性主义、新

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等,万象纷陈,炫人眼目。对当前种种现象,可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人们关注的核心点也仍然不外乎功能(实用、经济)、形式(美观、艺术)、结构(材料、高技术)、意义(历史、象征)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第二,其积极求新精神,仍有难能可贵之处。

当然,由于这本书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而作者又不幸早夭,因此,从书中还不能够充分窥悉20世纪最后十余年西方建筑理论的全貌。在这本书问世之后,也就是20世纪的最后15年中,正是西方建筑思想的一个转变期,出现了许多新的创作思潮与理论著述。要了解最近20年西方建筑理论发展的情况,我们还需要进一步阅读那些最新的西方建筑理论著述。但从本书的字里行间,读者可以注意到,对一些当代著名的建筑师,如文丘里、穆尔、菲利普·约翰逊、彼得·布莱克、查尔斯·詹克斯,以至于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等等,既追溯了他们思想的来龙去脉,公正地指出其中的敏锐独到之处,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主观夸大的风格,以及对历史材料的肤浅运用。如认为菲利普·约翰逊“将历史形式作为纯粹形式而自由地进行游戏却不注意政治与社会的文脉背景”,“他已将他的全部兴趣投入到纯粹形式之中”;又如对文丘里,在肯定其《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之余,批评其《向拉斯韦加斯学习》一书中的“结论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对新的建筑象征主义的探索,却采用一种武断的方式……把那些平庸的象征等同于以往时代的象征主义”(见本书第三十章),等等。这些实事求是的分析可以揭开习惯的概念面纱,使我们对西方大师有较为接近实际的认识。

对于这种把建筑被看作是一种技术和形式问题之现象的批判,亚历山大·楚尼斯教授指出:

“近年来在国际设计领域广为流传的两种倾向,即崇尚杂乱无章的非形式主义和推崇权力至上的形式主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非形式主义反对所有形式规则,形式主义则把形式规则的应用视为理所当然;尽管二者的对立如此鲜明,但在本质上,它们都是同出一源,认为任何建筑都是孤立存在的,并且仅仅局限于形式范畴,出于获取愉悦、表达象征,或者广告宣传的目的。大量的先进技术手段,被用于满足人们对形式的热烈追求,这已成为时代的一大特征,从分析形式的风格和类型,到表达复杂形式的构成,再到最奢华的形式梦想,其中的技术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地先进和发达,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屈从于对形式主义的幻想、好奇和迷恋。”(亚历山大·楚尼斯. 广义建筑学:一种现实主义的建筑道路.《北京宪章·序》)

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徘徊歧路,并不为过。

(七)回归基本原理——向往新的纪元

到了20世纪晚期,面对形形色色、莫衷一是的“主义”与“流派”,我们不妨看作是发展的过程,一些学者甚至直言不讳地提出要“回归基本原理”(Back to the basic),“混沌求序”(Order within chaos),并将这一概念写入1999年国际建协第20次大会所通过的《北京宪章》中,希望澄清建筑理论上这种纷繁不一,甚至混乱的状况。

什么是基本原理,为什么要回归基本原理?阅读完本书的读者,必然会有更多的思考,可以得到相应的结论。建筑的基本要素无非是功能的满足(实用、经济、安全等应属于基本的功能要求),科学技术的善为运用(手段进步了,作为扩大了,破坏性也随之扩大了)和完美形式的创造(怎样在“乱中求序”,达到建筑环境的和谐有序,怎样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为了本民族的、地方的文化基因的发掘与发展……),对此各个时代都在讨论,赋予新的内容,建筑师要有职业伦理,建筑业必须巧为利用地球自然资源,人类文化资源,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求得在复杂条件下,在各种基本要求满足下达到完美艺术的创造。几千年的西方建筑史是逐步形成的,它的理论也是逐步建立起来的,我们今天的时代要在完善它的功能要求下,剖析莫衷一是的各种主义,对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方面,寻求辩证统一,未始不能;汲取多学科、多文化的营养,发展新的理论,探求新的形式,书写新的一页。

(八)翻译引进西方理论著述十分必要

中国正处于一个建设的高峰期,我们面对了中国有史以来建设量最大的历史时期。因而,我们也面对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繁重而艰难的责任与重担。我们应该留给后人一些什么样的建筑遗产,我们应该为民众创造

一些什么样的城市景观,这些都是我们这一时代的建筑师所时时面对的问题。一个负责的规划师、建筑师是不可能对自己规划设计了些什么,这些规划设计作品对当代与今后的社会与文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视而不见的。在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纷繁而我们又肩负历史重担的时代,建筑师们更应该充分地充实我们自己的理论修养,也更应该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城市建设与建筑创作的探索之路,要尽量避免走那些西方人已经走过的弯路,也要尽量学习西方人在现代建筑中所创造的城市与建筑方面的经验。基于这样一种理由,对西方建筑理论著述,特别是系统地研究西方建筑理论思想发展过程的著述,就显得是十分必要的了。

对于这样一部洋洋大观的理论性著述进行翻译,没有相当的毅力与功力,是不敢轻易涉足的。我们要感谢译者王贵祥教授,在他还是清华学生的时候,在进行国家图书馆方案设计时,我们曾在一起,他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曾追随莫宗江先生治中国建筑史学,后来又关注中西建筑思想与文化的比较研究。在国外进修期间,他特别留意了西方建筑理论与建筑理论史方面的著作,为了弥补国内在建筑理论及理论史研究与译介方面的不足。他能够知难而进,经过近三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将这本书呈现在了读者面前,使我们对西方建筑理论的历史有了—个比较宏观和全面的了解。这对于促进我们自己的理论思考,无疑是会起到一些促进作用的,其中有些真知灼见与警句很能发人深思。据我所知,他还正在承担着一套两册本的西方建筑理论著作的翻译工作,书名就是《建筑理论》,这是一套系统论述西方传统与现代建筑思想中的种种概念与范畴的理论性很强的著作,我希望这两册即将问世的译著与我们面前的这本书能够成为一个系列,使我们的读者更能增加在建筑理论问题上的兴趣与热情。承王贵祥教授之嘱,要我为这本书的中译本作序,我认真仔细地读完了全书的译稿,深感获益匪浅,不禁思绪万千,希望我们的同道能够充分关注建筑理论问题,若能以此书的出版为契机,更为广泛地涉猎拉丁美洲、澳洲以及我们所在的亚洲,特别是日本、印度等多元文化的成就,融中外建筑理论之长,提高中国社会的建筑理论之修养,进一步繁荣中国的建筑创作,则觉幸甚。

二

读完这部理论史著,我深感中西方在建筑学术发展上的差异,当然不能不联想中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并由此联想到了中国建筑发展的道路问题以及提高建筑理论修养之重要与迫切。

(一)中国有辉煌的建筑文化遗产,但理论“富矿”尚待“发掘”与提炼

在中国历史上,建筑理论的发展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形成一整套较为完整的体系。当然,这并不是说,与西方相比,中国建筑文化显得低下一些,全然不是!否则就无法解释中国古代数千年从名都大邑到各类城市,再到分布各地的集镇村落之一脉相承的发展,也不能解释从宫殿、寺观到坛庙、祠堂,乃至村舍、民居,蔚为大观的中国古代建筑成就是如何产生并形成体系的。不过,这些成就虽然见诸于遗存的实物,也见诸于历史文献的字里行间,却并没能整理成为系统的文字专著。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建筑著作几如凤毛麟角。隋代的宇文恺经营大兴、洛阳,其功甚伟,可惜记录有限。宋代的《营造法式》是一部官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传承,例如其中可能包含有已经失传了的喻皓《木经》的点滴余绪,循此可以解开古代建筑构造体系的密码,因而具有极高的历史与学术价值,但这毕竟不能算一部理论性的著述。明代的《园冶》可以说是一部罕见的,具有独特中国思维特征的园林、建筑著作,作者是一位文人士大夫,具有创作实践经验,因此这是一部用优美的文字阐述了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中国古典园林的学术性著作,其丰富的理论内涵,不仅对园林艺术,而且对建筑、文学、绘画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然而,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类的理论著述实在是太少,太分散,太难得了。

尽管中国有建筑、陶瓷和纺织三大技术,有如赵州桥等很早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技术创造,但中国古代没有把经验上升为理论的需求,缺乏把经验上升为理论的方法。*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历史上当然不乏能工巧匠,但是他们没有社会地位,虽然常常匠思独运,却不具有能够书写的文化,而把握着话语权的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们却将工巧技艺看作雕虫小技,又不齿于为工匠们著书立说。因此,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名城赋、名楼赋,有大功告成大宴宾客的诗词名篇,留下

*张雁 严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与未来科学技术发展展望.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第24卷.第2期.

了对巨构奇巧富丽的赞语,甚少有较完整的与建筑相关的文字记录,更谈不上理论学术性的煌煌大著了。朱桂老等先生曾将这些零散记录辑于“哲匠录”中,使人们能够一窥历史上的那些点点滴滴的深邃哲思。不过,即便这些经过辑录的文字,也是语焉不详,甚或挂一漏万。这种情况的根本改变,仅仅是近百年的事情。随着西方的建筑学术理论方法,进入建筑教育、建筑创作与建筑史学研究领域,并经过了建筑领域学术先驱们的披荆斩棘,其开拓之功将永远留诸史册。薪火相传,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伴随建筑史学的发展、建筑文化丛书的编纂、地区建筑的发掘、建筑美学理论的探索,古代建筑世家“样式雷”的研究整理,等等,如今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已经呈现一片繁花似锦、欣欣向荣的局面。尤其引人瞩目的是近些年陆续问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的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编撰,同时,在建筑文化丛书的编撰出版,民族与地区和乡土与民居建筑的考察研究,以及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的探讨与总结等方面,都出现了许多令人可喜的成果。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有更多的期待:第一,我们还没有深刻揭示出诚如李约瑟所指出的中国设计理念的高度条理性、结构性、分析性与综合性。对此,李约瑟的治学精神和浩瀚的贡献,深感激励。第二,目前的研究还不足以从理论上协助解答当前现实建设中的矛盾与出路;第三,我们还未能更为广阔深入地比较中西建筑文化……。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建筑理论与建筑文化的研究,包括城市史学、古代建筑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方法、地区建筑与乡土建筑,以及加强建筑评论等等,以期能够为推进建筑创作与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园林设计等建设实践工作的深入,提高对中华建筑文化特色的发掘,以及理论创新思想体系的形成。

回到建筑理论问题上,一般说来,我们所缺的课太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度是西方建筑理论的繁荣期。在1950年代以前,为数不多的中国建筑师并没有切断这种联系,他们能够出入国门,也能够看到西方的书籍、杂志等。在此之后的一个时期内,与外部学术的沟通几乎断绝了。当然,对于学习苏联我们毋庸全盘否定,因为对于当时的基础提高毕竟有所帮助。*

(二)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建筑理论发展的曲折道路

中国建筑理论发展的迟缓有其社会的背景,即在20世纪50年代的建国之初,在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下,整个社会在中与西、古与今的时代漩涡中挤撞,建筑也不例外,久怀理想的知识层们都希望能够一展宏图。梁思成先生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一旗帜下,提倡建筑的“民族形式”,在当时的爱国激情下,理论固有偏颇之处,结果被批判为所谓“复古主义”、“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等等;张镈大师在一次座谈会上面对当时的建筑学会理事长、建工部副部长,不无幽默地说:“今天批一个‘主义’,明天批一个‘主义’,弄得我下笔没有主意了”,一语道出了当时设计者莫所是从的心态。在1958年为迎接国庆十周年而启动了十大工程之后,设计者一时缩手缩脚的情况显得更为突出,虽然有关方面一再动员设计者们要解放思想,要古今中外为我所用,甚至还提出“大屋顶也可以用”等,工程设计在进行着,各种议论纷纷纭纭。1959年的上海建筑艺术座谈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这个会开得很开放,几乎所有建筑界的代表人物都被邀参加,大家踊跃发言。当时的建工部长刘秀峰也很投入,阅读有关书籍文件,会上倾听发言,夜晚准备报告,并委托工作班子邀请部分学者答疑,最后以“创造中国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为题,作了总结发言。这是建国以来政府官员与建筑专家进行交流,并结合自己的理解所作的最好的理论总结。这篇报告在建筑界的反映是积极的,后来又展开了有关风格问题的讨论,一时间建筑理论的热情空前高涨。然而,这一切又被随之而来的“大批判”所扑灭。随着急风暴雨式的文革运动的到来,批判更加变本加厉,甚至刘秀峰本人亦未能幸免。后来,在武汉的鲍鼎老师给我来信,告知他为写了有关“风格”问题的文章而遭批判,字里行间依然可以感觉到心有余悸。回顾这段历史的曲折道路可以看出,建筑学术的发展固应该有批判精神,更需要有技术专家与社会人士的广泛参与,但这必须是在科学的、有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任何简单化的处理,非但不能够发展学术事业,完善建筑理论,反而会对理论的探索起到消极阻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后,前进中的困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经济体制的转型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此节就建筑理论发展而言,并不涉及对这一时期的全面评价。

与房地产业的兴起,等等,这一切都极大地影响了建筑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建筑事业的兴旺。渐渐地,国际建筑师瞄准了中国这一巨大市场的吸引力,纷纷前来“抢滩”,从而也打破了原来公有设计院一统天下的局面。旧的体制制度,旧的建筑标准价值观等被打破了,亟需建立新的体系。新体系的建立固然应该立足于实践的基础之上,但理论的建设也应是不可或缺的。

事实上,无论中外,都有一些人,包括一些建筑设计领域的大家,不太爱看理论书籍,习惯于从形式上看问题(当然,形象上的艺术性在建筑中始终是很重要的问题,建筑大家不谈理论并不等于没有见解、修养与水平),但一般不求甚解,对于建筑上呈现的五花八门的现象,以自己直观的好恶为取舍。在当前建设急剧发展,设计过程匆忙,创作风气浮躁的情况下,面对理论的空缺,人们感到了茫然,从而出现了与1950年代截然相反,却又似乎有些相似的,即为种种西方流派所困惑,在并没有任何“主义”的帽子扣压下,呈现出另外一种“下笔没有主意”的现象。我心情沉重地把话说得重一点,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一个悲剧,是理论的迷茫与思想的贫困,是对我们长期轻视理论思维的一种惩罚。

我过去一向认为,像我国当前这样快的发展速度,这样大规模的建设量,必然要出现第一流的建筑理论、建筑精品、建筑大师,现在看来,理论上应该如此,并不以为过,但也急迫不得。在对我国现实情况作了粗略的分析之后,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建筑事业各方面的进步,并不乏成功之作,人才逐步浮出水面,新事物萌生,但我们的学术理论空气仍是太沉闷了,建筑评论、方案评审并未多涉及理论问题,这也触及了当前阻碍我们建筑创作水平提高的深层原因,包括体制、社会认识,等等,其中整体理论水平的缺失,不能不说是关键问题之一。然而,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回归基本原理”,进行理论的基本建设,而当前建筑界针对所费不赀的“畸形建筑”的频频出现,土地、资源的浪费,不切实际、与国力不相称的高标准,因而重新引起的有关“实用、经济、美观”的讨论,其用意是良善的,而其声音却也是软弱的。这种现象如不及时唤起建筑学术界代表人物足够的注意,这是难以向历史交待的。

(四)迎接中国建筑文化的复兴需要建筑理论的繁荣

综上所述,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遗产,可惜基于历史原因,对历史传承与理论总结与开拓明显不足。1950年代以来直至文革,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频繁的批判之后所造成的思想混乱与理论真空,至今仍然存有后遗症;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一度与西方建筑在学术沟通上的中断,中国建筑界的许多人,对西方现代建筑的理论与实践,都缺乏全盘而贯通的了解,忽然又面对了所谓“现代建筑已经死亡”的尴尬局面,以及蜂拥而至的20世纪最后20年西方建筑理论领域中虽然驳杂却并不成熟的学派纷呈、莫衷一是的表面繁荣现象,使得中国建筑师,包括有才华的青年一代,一时间变得无所适从。近些年来在建筑史学、建设实践方面虽然有可喜的发展,但还不能说对我们的理论建设起到了足够的影响。

探索中国建筑文化的前进道路,应该要与对西方学习借鉴,包括在建筑理论方面的学习,并要与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探索和实践总结联系起来考虑,以求我们所面临的时代任务进行战略思考。具体说来:

第一,我们在谈论要活跃自己的理论思维时,一般总是希望注意不要陷入盲目跟风、追求时尚的误区,更不要把建筑等同绘画和雕塑一样纯艺术的东西,从而过分热衷于某种有悖理性或不合逻辑的新潮或前卫。但是,这些诚恳的话往往难以被人们(包括我们社会与青年学生)接受和理解。相信读者若能对理论多花一些功夫,例如对这本西方建筑理论史著作加以细心的研读,多了解一些在各时代发展过程中引起的建筑思想的变化与论争,就能透过前人的一些智慧与迷惘,来审视今天所面临的问题。

第二,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与交融是必然现象,并会日益趋明显,对此需要提高认识,不断剖析全球的大趋势,对动态的发展有所察觉,增加对新事物的敏感,汲取其有益的东西,同时还要积极地、深入地发掘民族的、地区的建筑文化。传统文化可能是创造的源泉,例如对比西方建筑理论的发展,建筑、城市规划与园林并行发展,而中国从古代秦汉都城起,就趋于整体发展,这种整体观念可视为优良的、独具特色的传统(李约瑟早就提出要恢复中国的自信心,中国是一条流入近代科学之河的同重要的支流,从而更正了对中国的忽视)。我们应该确信,中国建筑文化对于世界建筑文化的发展过程终将会是有所作为的。从上世纪30年代起对江南园林的发掘,40年代起对“四川民居”、“浙江建筑采风”等民居的研究,到今天对“地区建筑”的发掘与创作的探索所取得的成果,都足以证明这一点。

第三，尽管我们过去走过了曲折的道路，而且直至今日仍然存在着不少困惑，摆在中国建筑师面前的人口众多、资源贫乏、地区发展差距、城乡差别、社会不同阶层居住水平差距悬殊等种种问题，既困扰着我们，又激发我们对切合中国实际的、不同于西方的道路的探索，我们不能丧失信心。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仍然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未来走向。关键有待我们如何作为，当前中国建筑文化的深入发展，也必然会留下与这一趋势与走向密切关联的深刻烙印。

第四，以上是就中国建筑文化发展战略道路而言，而不仅着眼于建筑形式，建筑形式是多方面因素、多种条件发展的表现，不可能主观地预为设定，需要随时代、随条件的变化而赓续创造，而与环境协调、和而不同、违而不乱、体现文化、求实精神等倒是不易的基本原则，应予以恪守。

我们肩负着中国文化复兴的时代重任，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经历长期而艰苦的努力，而提高建筑理论修养与水平，无论如何，是我们所必备的基本条件和素质。我们并不能够要求每一位专业工作者都成为理论家，因为如前所云，无论中外都有一些非常出色的大家，他们甚至无意涉及理论问题，例如本书就批判了 1945 年以来的美国建筑倾向：“相对于实际建造的建筑而言，理论问题通常只是处于次要的地位”，“最为成功的美国建筑设计企业都是将技术与形式结合在一起构造房屋的，对理论问题缺乏必要的关注”（见本书第三十章）。但是，在实践与理论方面并行发展者也大有人在，如果一位建筑师既能够有出色的作品问世，同时也能够有发人深省的理论建树，其“立言”就更能入木三分，岂不更能够为世人留下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吗。为此我们寄希望于同行专家与青年学者。当然，不仅专业工作者要提高理论素养，还需要全社会来提高建筑文化水平，《北京宪章》曾建议提倡“全社会的建筑学”，这包括建筑鉴赏水平、建筑理论修养与建筑决策水平的提高。正是在这部《建筑理论史》中曾谈到了，“在 17 世纪晚期由非建筑师完成的建筑论著在法国建筑理论中变得越发重要起来”（见本书第十一章），这给予我们以极大的启示：在新世纪的城市化进程中，面临新的建筑发展潮流，我们一定要推动提高人们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文化自觉、文化自强与文化自新的意识，从而引发全社会对建筑理论与建筑文化的重视与参与，最终达到提高全民族建筑文化意识的目的。

（五）树立东方建筑文化发展观，立足世界建筑之林

需要特别明确的是，无论东方与西方建筑文化，都有其精华与糟粕，这需要有清醒的头脑与刻苦的努力加以鉴别，并扬长避短，为我所用。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对于西方建筑及其理论，特别是对其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的了解，还很肤浅，而且现代某些形形色色的理论还在其发展过程中，本身每每就很肤浅，今天我们的许多创作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漫无目的地模仿与重复，缺乏理论，甚至缺乏理论探索的意识，走着某种形式主义的道路，或者说是一种非形式的形式主义，甚至是一种盲目的跟风。

要改变这样一种情况，就要在学习与了解西方建筑理论与历史的过程中学习他们的历史经验，关注他们所争论问题的焦点，认识到在文化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才是各个时代的主旋律，从而不至于被某些多少有点扭曲了的所谓“主义”而一叶障目，窒息了自己的创造才智。要扩大对建筑的视野，关心研究泛建筑专业圈对人类居住问题的探索，以及对当前建筑发展道路的新思考等，还要学习与研究中国自己的哲学思想，总结这半个世纪以来自己实践中的成绩与教训，逐步找出并创立自己的建筑理论脉络与体系。当然，这种可称之为“自主创新”的道路，还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好在面前这部鸿篇巨制为我们勾画出了西方建筑理论历史的大致轮廓，对于我们了解西方建筑理论的发展与得失，能够有一些助益。当然，必须认清的一点是，西方并未终结，也并非终结真理，而我们的时代却正处于宏伟的开始，面对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在汲取他人之长时，要能够辨中西之别，通古今之变，从而建构我们中国自己的建筑理论体系，这对于我们的理论提高与创作实践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也许就是本书对于我们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所在。



2005 年 2 月 28 日